建道學刊 **50 (2018): 31-62**

中國內戰時期的宣道會（1945-1952）[1]

何明章
宣道會美門堂
Mei Mun Alliance Church

一　引言

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前，中國是宣道會海外宣教的一個重要工場。1887 年，宣信（A. B. Simpson）在美國紐約創立宣道會之時，便即差派加拿大人賈錫德先生 （William Cassidy）前往中國，可惜賈先生在途中感染天花辭世。翌年，賈夫人延續丈夫的心志，攜同兩位女兒與另外兩名女西教士同袍由美國啟程來華。她們在 1889 年 1 月抵達香港，成為宣道會首批踏足中國的西教士。[2] 當時，中國大陸沿海早已有相當數量的宣教差會進駐，因此，宣道會選擇走進內陸偏遠的地方，尋找未聞福音的羣體開展工作。四十多年以後，抗日戰爭爆發，西教士陸續撤出中國，

---

[1] 本文曾在「第十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中被公開宣讀，日期為2017年6月16日。

[2] L. Cassidy, "Letter from Mrs. Cassidy," *The Christian Alliance and Missionary Weekly* 3, no. 18 (29 Nov., 1889): 285.

那時宣道會已在七個內陸省分建立了四個教區，分別為：華中教區（湖北省、安徽省、上海）、華南教區（廣西省、香港）、華西教區（甘肅省）及川黔教區（湖南省、四川省、貴州省）。當時四個教區西教士人數約有 103 名、華人同工 240 名、會友合計 5,000 人以上。[3] 二戰結束後，該會西教士陸續返回中國，希望召集四散的信徒並重建荒廢的教區；但不久卻迎來國、共兩黨逐鹿中原、戰火瀰漫的艱難歲月。

宣道會在中國內戰時期的活動，迄今仍是一段相當模糊、鮮為人知的歷史。現時，稍有提及該段歷史的著述，就只有羅腓力編著的《宣道與中華》[4] 及梁家麟編著的《華人宣道會百年史》[5]，但內容不多。因此，本文透過利用該會西差會檔案資料、西教士的傳記及中國教會的零碎紀錄，以宏觀的角度來描繪昔日宣道會從 1945 年抗戰勝利後西教士開始重返中國宣教工場起，至解放時西教士全面撤離大陸，最後在 1952 年差會與國內教會完全分離的一段往事。

二　內戰時期西教士數目與各教區的重建工作

（一）二戰後西教士重返宣教工場

1945 年初，宣道會仍留守在中國大陸的西教士，就只有華南教區的丁惠民牧師（Rev. August F. Desterhaft）、湯普森姑娘（Miss Helen Thompson）及華西教區季維善牧師（Rev. M. G. Griebenow）。[6] 首位由美國重返中國工場，則是華中教區白光照牧師（Rev. Roy J. Birkey）；他在 1945 年 4 月 8 日由美國啟航，當時二戰尚未結束。[7] 返華時，他加入

---

[3] Alfred C. Snead, *Missionary Atlas: A Manual of the Foreign Work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Harrisburg, Christian Publications, Inc., 1936), 77.

[4] 羅腓力：《宣道與中華》（香港：宣道，1997）。

[5] 梁家麟：《華人宣道會百年史》（香港：建道神學院，1998）。

[6] "Work and Worker," *The Alliance Weekly* 81, no. 34 (24 Aug., 1946): 541.

[7] "Work and Worker," *The Alliance Weekly* 80, no. 9 (5 May, 1945): 139.

一個前往印度的軍團，坐船經非洲大陸進入印度，再轉乘飛機飛越喜馬拉雅山進入中國境內，最後在重慶下機，旅途可算是相當迂迴。白氏此行是以宣道會總會代表身分返回中國處理四個教區的事宜，首要任務是接替在二戰時仍留守中國後方的丁惠民和湯普森的工作。[8] 當時丁牧師在中國已有八年以上的時間，與湯氏在重慶處理宣道會的財務及聯絡工作，期間歷盡艱辛，需要他人來接替。[9] 白牧師的到來好讓兩人返回美國休息，與分隔多年的家人團聚。[10]

抗戰勝利後，白光照隨即由重慶返回原屬華中教區。[11] 其他西教士則要等到 1946 年和 1947 年，中國再度爆發內戰時才可由美國啟程返回中國。最主要原因，是戰後各國都需要時間來恢復秩序，這包括交通運輸系統。當時，大批羣眾聚集在歐、美各個港口，爭相乘搭輪船前往別的地方；人潮要等到 1947 年中旬才回復正常秩序。根據宣道會的紀錄，在 1946 年初已有不少西教士擁擠在美國西岸港口，等待機會返回中國。[12] 至 1946 年尾，不同差會為使西教士能儘早啟程返回工場，便聯合租借軍用船艦「海貓號」（Marine Lynx）運送多名西教士與家眷共七百多人由三藩市前赴上海，啟航時間為 12 月 15 日。[13] 由此可見，戰後國際航運的緊張情況。

第二批戰後來華的宣道會西教士，有華南教區陳法言牧師夫婦（Rev. and Mrs. W. H. Oldfield）、貝光道牧師（Rev. John Bechtel）、林明德牧師（Rev. Ray M. Clemmer）及何恩德牧師（Rev. Ray A. Kowles）。他們

---

[8] "Requests for Prayer," *The Alliance Weekly* 80, no.6 (24 March, 1945): 90.

[9] "Last Minute Foreign," *The Alliance Weekly* 80, no. 2 (27 Jan., 1945): 19.

[10] "Work and Worker," *The Alliance Weekly* 81, no.2 (12 Jan., 1946): 28.

[11] 1945年12月，白光照由重慶返抵漢口，重整華中教區，參 "Requests For Prayer," *The Alliance Weekly* 80, no. 29 (29 Dec., 1945): 475; "Requests for Prayer," *The Alliance Weekly* 81, no.13 (30 March, 1946): 202.

[12] "Requests for Prayer," *The Alliance Weekly* 81, no.13 (30 March, 1946):202.

[13] 包忠傑：《包忠傑自傳》（香港：宣道，2006），頁147～148；Anthony Bollback, *To China and Back* (Pennsylvania, Christian Publications, 1991), 22。

在 1946 年 3 月 4 日抵達上海，[14] 然後在 5 月抵達廣西梧州。[15] 另外，華中教區的漢森牧師（Rev. Arthur J. Hansen，筆者譯）也在 1946 年 4 月返抵漢口。[16] 在往後一年半的時間，該會西教士就這樣斷斷續續來到中國；當中最大的隊伍，是在 1947 年秋，約有三十位西教士準備由美國啟程來華。那時，國共兩軍已展開大規模混戰，國內情況相當混亂 —— 運輸不便、貨幣貶值、物價高漲；[17] 而共軍亦開始威脅湖北省及安徽省等華中地方，有嘗試奪取長江流域的姿勢。[18]

根據宣道會的文獻紀錄，[19] 該會在內戰時期約有 86 名西教士分散在四個教區工作；當中 51 人是重返教區有經驗的舊人，其餘 35 人則是剛加入中國宣教行列的新人。各區西教士人數如下：華西教區有 23 人（10 位舊人、13 位新人）；川黔教區有 11 人（7 位舊人、4 位新人）；華南教區有 32 人（21 位舊人、11 位新人）；華中教區有 20 人（13 位舊人、7 位新人）。相比抗日戰爭爆發以前，宣道會在華西教士人數減少約有兩成（約少了 17 人）。[20] 這現象相信是與中國爆發全面內戰，一些西教士打消前往中國工作的念頭，不無關係。

---

[14] "Requests for Prayer," *The Alliance Weekly* 81, no. 13 (30 March, 1946): 202.

[15] "Requests for Prayer," *The Alliance Weekly* 81, no. 21 (25 May, 1946): 330.

[16] "Requests for Prayer," *The Alliance Weekly* 81, no. 17 (27 April, 1946): 267.

[17] "One for Another," *The Alliance Weekly* 82, no. 43 (25 Oct., 1947): 683.

[18] "One for Another," *The Alliance Weekly* 82, no. 52 (27 Dec., 1947): 826.

[19] 數字是根據宣道會1945至1947年來華西教士的總和。1945年只有白光照牧師（Rev. Roy J. Birkey）來華；1946年來華西教士數目根據以下資料: "Missionary Reoccupation and Advance in 1946," *The Alliance Weekly* 82, no.10 (8 March,1947): 152-56。1947年來華西教士數目根據以下資料: "Distribution of Missionaries in 1947," *The Alliance Weekly* 83, no. 5 (31 Jan., 1948): 66-74。

[20] 與1936年的數字比較，參考 Snead, *Missionary Atlas* (1936), 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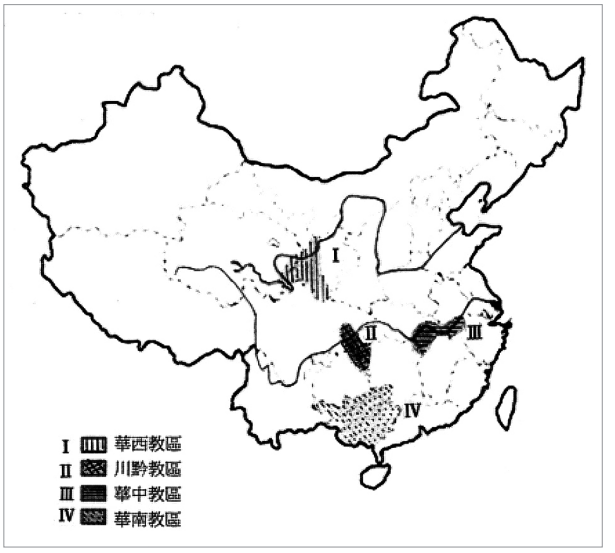

圖1：中國內戰時期宣道會四個教區的所在位置

圖2：華西教區 （地名有底線為宣道會的宣教點）[21]

[21] Snead, *Missionary Atlas* (1950), 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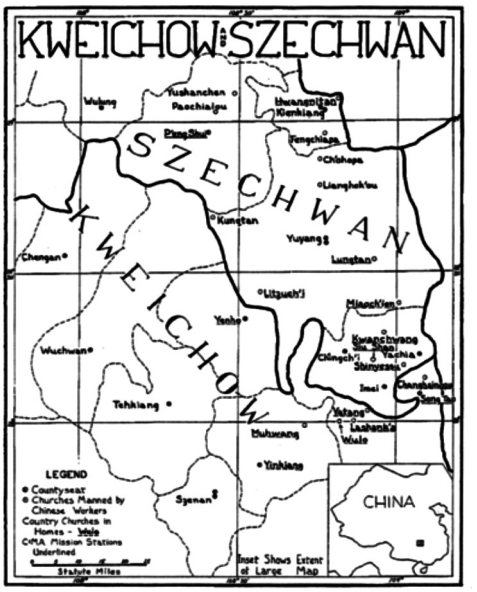

圖3：川黔教區 （地名有底線為宣道會的宣教點）[22]

圖4：華中教區 （地名有底線為宣道會的宣教點）[23]

[22] Snead, *Missionary Atlas* (1950), 105.

[23] Snead, *Missionary Atlas* (1950), 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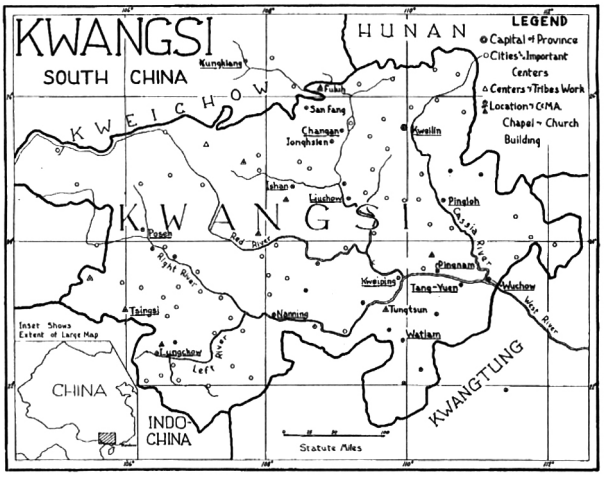

圖5：華南教區 （地名有底線為宣道會的宣教點）[24]

（二）內戰時期宣道會的重建工作

中日戰爭，兩軍會戰大多發生在華東、華中及廣西一帶區域。因此，戰事對宣道會的影響，亦主要集中在華中和華南兩個教區；假若以教會建築物的損毀程度作指標，影響最為嚴重莫過於華南教區。1946 年 5 月，當首批華南西教士由海外返抵教區時，一切事物已變得滿目瘡痍。許多信徒失去一切，私人住宅及教堂被炸毀，四處是無家可歸的人。在梧州，宣道會的建築物幾乎沒有一所是完好的，大多只剩下燒焦熏黑的外牆，到處是一堆又一堆的碎石瓦礫；昔日的教會大樓、梧州聖經學院校舍及西教士宿舍均嚴重毀壞。[25] 柳州的情況也是如此，該市在日軍撤出之時，有三分之二的地方陷於火海，城內房屋嚴重焚毀，該會的大樓及同工宿

[24] Snead, *Missionary Atlas* (1950), 116.

[25] W. H. Oldfield, "Distributing Relief in War-torn Areas," *The Alliance Weekly* 81, no. 33 (17 Aug., 1946): 520; John Bechtel, "A Pictorial Report from South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81, no.38 (21 Sept.,1946): 600-602; Snead, *Missionary Atlas* (1950), 117.

舍亦遭殃。[26] 至於華中教區，情況雖不及華南教區嚴重，但多處教堂、西教士宿舍及信徒房屋亦受不同程度的破壞。[27]

抗戰時期，西教士撤離中國，華人信徒遠走他鄉，宣教據點飽受戰火摧殘，都迫使教會工作停頓下來。該會除華西教區的情況較為理想外，其餘三區的聚會所與宣教站大多已關閉。少數仍留守教會的華人傳道，經過戰爭的威嚇、長期的食物不足，致使身心靈嚴重受創。[28] 在華南教區，兩位華人領袖趙柳塘先生和楊濬哲先生，亦因太過勞累而出現健康問題。[29] 抗戰前，一些地方教會原本是能夠自養自足，勝利後卻需要差會的大力支援才可以重新起步。[30]

宣道會第一批重返工場的西教士，全是有相當經驗的；他們首要任務是展開救濟與重建教區工作。[31] 西教士先將從美國籌措得來的衣服和白米等生活必需品，分發給瘦骨嶙峋、衣衫襤褸的當地居民，然後召回信徒並勉勵重新振作。他們隨即重建已損毀的教堂、聖經學院及中西同工宿舍，希望教會能儘快恢復運作。[32] 其實，在西教士到來以先，部分華人同工領袖早已開展教會的復修工作，他們大多在極其貧乏的情況下苦苦支撐，尋找失散的信徒、安慰痛失家園及至親的心靈。一些地區，信徒已開始在破爛的教堂舉行崇拜聚會。[33] 西教士的回歸，相信對本地

---

[26] Mrs. W. H. Oldfield, "Reoccupying South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82, no.1 (4 Jan.,1947): 9.

[27] "One for Another," *The Alliance Weekly* 82, no. 17 (26 April, 1947): 267.

[28] Oldfield, "Distributing Relief in War-torn Areas," 520; "Requests For Prayer," *The Alliance Weekly* 81, no. 35 (31 Aug., 1946): 555; "One For Another," *The Alliance Weekly* 82, no.4 (25 Jan., 1947): 57.

[29] "One for Another," *The Alliance Weekly* 81, no. 52 (28 Dec., 1946): 811.

[30] Snead, *Missionary Atlas* (1950), 120.

[31] "Requests for Prayer," *The Alliance Weekly* 81, no. 17 (27 April, 1946): 267.

[32] "A Pictorial Report from South China," 600-602; "Requests for Prayer," *The Alliance Weekly* 81, no. 21(25 May, 1946): 330; "Of Far Countries," *The Alliance Weekly* 82, no. 21 (24 May, 1947): 329-30.

[33] "A Pictorial Report from South China," 600-602.

華人同工是既得安慰，又可讓他們舒一口氣。不過，復原工作是相當緩慢地進行；如上所述，在 1946 年夏季，重返教區的西教士只有寥寥數名，雖然大多是經驗豐富的西教士，卻杯水車薪。至於華人同工方面，以當時華人領袖沙毅牧師的話可以說明：「工人相當缺乏；一些同工已喪命（在抗戰時期），一些則太過年老，一些疾病纏身，一些則已離開崗位……」[34] 剩下的少數已疲憊不堪。再者，國內嚴峻的政治與經濟環境也是另一關鍵；當時國、共兩軍已開展了大大小小的爭奪戰，導致物價飛漲、治安不良、交通斷絕。[35]

及至 1947 年中旬，宣道會各教區才漸漸回復抗戰前的面貌。隨着新、舊西教士一批又一批的抵達，華人同工和信徒亦日漸增多，教會慢慢回復往昔的活力。而最早復原的，要算是華西教區；因該區並沒遭受炮火的蹂躪，抗戰的影響僅是缺乏西教士而已。1946 年上旬，在該會華人與內地會西教士共同協作下，華西聖經學院得以復課；兩年後，該會有足夠的西教士進駐，學院才歸回宣道會接管。[36] 1946 年下旬，第一對西教士孫守成牧師夫婦（Rev. & Mrs. C. E. Carlson）重返華西教區，[37] 便隨即在藏人區域展開全新事工。[38] 1947 年 4 月，該區華人議會在臨洮舉行勝利後首次會議。[39] 1948 年，華西區共有 122 人受洗加入教會，並有大量的中學生、大專生及學校老師出席教會聚會，求道之心熱切。[40] 在

---

[34] "Requests for Prayer," *The Alliance Weekly* 81, no. 17 (27 April, 1946): 267.

[35] "One for Another," *The Alliance Weekly* 81, no. 43 (26 Oct., 1946): 683; "One for Another," *The Alliance Weekly* 82, no. 43 (25 Oct., 1947): 683.

[36] 根據西差會的紀錄，該聖經學院名為：「中央聖經學校」(The Central Bible School)；該校大約在1900年於臨洮成立，因西教士的撤離而停辦。1946年由當地華會與中國內地會合作，在甘肅首府蘭州開辦聯合聖經學校；至1948年秋，該校再由宣道會西差會重新接管。資料參： "Requests for Prayer," *The Alliance Weekly* 81, no. 21 (25 May, 1946): 330; Snead, *Missionary Atlas* (1950), 102.

[37] "Requests for Prayer," *The Alliance Weekly* 81, no. 35 (31 Aug., 1946): 267.

[38] "One for Another," *The Alliance Weekly* 81, no. 52 (28 Dec., 1946): 811.

[39] "One for Another," *The Alliance Weekly* 82, no. 13 (29 March, 1947): 203.

[40] Snead, *Missionary Atlas* (1950), 103.

華南教區方面，該區是宣道會在勝利後投放資源最多的中國工場，復修工作雖困難重重，但過程總算順利。首先，西差會將總部由廣西邊境的梧州，遷到廣西的心臟地帶柳州，以方便支援各地教會。1946 年，建道聖經學院在梧州白鶴山唯一沒有遭炮火破壞的宣道會建築物內復課。[41] 同年，該教區打破歷年受洗的人數紀錄。[42] 1947 年，大量西教士投入工作，大部分宣教站得以重開，各項工作亦大有起色；[43] 停了八年的華人省聯會，亦於該年 8 月再度舉行。[44] 至於華中及川黔教區，因西教士數量已大不如前，很多事工都轉由少數華人領袖勉力支撐；[45] 加上位處中原，在 1947 年起已飽受內戰陰霾的影響，工作實難有太大進展。隸屬兩教區的武昌聖經學院，則要遲至 1949 年 2 月才正式復校。[46] 不過，在解放前兩區受洗人數都錄得非常可觀的數量，川黔區更是打破歷年紀錄。[47] 除此以外，王峙先生與西差會領袖包忠傑牧師（Rev. Paul H. Bartel）在上海恢復宣道書局的工作；雖然所有稿件書報在抗戰時全部失去，但經過他們一番努力，停刊六年的《聖經報》得以在 1947 年初重新面世，訂戶不久便增至一萬以上；書局後來更在武昌與重慶設立分局。[48]《聖經報》的復刊，對造就信徒和培育華人傳道方面，均有莫大的裨益。

---

[41] A. F. Desterhaft, "Letter to Dr. A. C. Snead," (30 Aug., 1948); Snead, *Missionary Atlas* (1950), 117.

[42] "One for Another," *The Alliance Weekly* 82, no.35 (30 Aug., 1947): 555.

[43] "One for Another," *The Alliance Weekly* 82, no.4 (27 Jan., 1947): 57.

[44] A. F. Desterhaft, "Chairman's Report to South China Conference (Sept. 1947)."

[45] Snead, *Missionary Atlas* (1950), 106-107, 110; "One for Another," *The Alliance Weekly* 81, no. 52 (28 Dec., 1946): 811.

[46] Snead, *Missionary Atlas* (1950), 112; "One for Another," *The Alliance Weekly* 84, no.18 (30 April, 1949): 57. 在復校之前，學院工作分散在常德、漢壽及茂林開辦課程，訓練華人同工。

[47] 1948年川黔教區及華中教區受洗人數分別為92人及351人，參 Snead, *Missionary Atlas* (1950), 106,110.

[48] 參包忠傑：《包忠傑自傳》，頁149；何華新：〈宣道書局〉，《基督教週報》第420期，1972年9月10日。〈宣道書局〉一文內容相信是由宣道書局韋德仁牧師 （Rev. Cliff Westergren）提供。宣道書局及《聖經報》是在民國初年由宣道會西教士翟輔民牧師創辦。

總括來說，雖然教區的重建是在國共兩軍爭鬥得你死我活之時，但因宣道會的工作是位處長江以南及偏遠的西北地區，四個教區均可有時間與機會作不同程度的復原。而在 1948 年至 1949 年間，各教區更經歷了一段短時間的復興；[49] 至最後才被內戰及解放運動所打斷。根據 1950 年美國宣道總會國外部的統計，在 1947 年至 1949 年間，該會在中國平均有 86 名西教士、225 名本地華人同工，分別在七個內陸省分工作。[50] 直至 1950 年，中國宣道會的會友數目，在華西教區有 950 人、川黔教區 525 人、華中教區 3,750 人、華南教區有 2,993 人，四區合共 8,218 人；此數字相比於 1936 年抗日戰爭爆發之際，增長了 64%。[51]

三　宣道會在內戰威脅下的調度與安排

抗戰勝利後，當宣道會西教士由美洲返抵中國工場之時，國共雙方已爆發全面內戰。在 1946 年至 1947 年上旬，四個宣教區所屬範圍仍然感受不到內戰所帶來的威脅。直至 1947 年 7 月，共軍開始在中原地區靠攏，華中教區率先感受到內戰的壓力；中、西同工首次要為嚴峻的政治局勢展開會議，商討該教區未來的發展路向；會議定在該年的 10 月 14 至 20 日舉行。[52] 8 月，共軍將要進入武漢的消息此起彼落，令到人心惶惶。當時宣道會、浸信會、內地會及路德會有相當數量西教士在漢口北部的雞公山避暑，收到消息後需要作緊急撤離；[53] 這是宣道會因內戰威脅的首次撤退行動。在 10 月華中教區舉行會議之前，共軍已推進至離長江北岸 20 公里的地方；而教區內兩宣教站的所在地 —— 魯港、茂林 ——

---

[49] 1948年，四個教區受洗加入教會的人數均有明顯增長。

[50] Snead, *Missionary Atlas* (1950), 96.

[51] "Our Responsibility for China: Prayer," *The Alliance Weekly* 88, no. 7 (18 Feb., 1953): 16.

[52] "One for Another," *The Alliance Weekly* 82, no.30 (26 July, 1947): 475; "One For Another" , *The Alliance Weekly* 82, no. 39 (27 Sept, 1947): 619.

[53] Bollback, *To China and Back*, 39-46.

亦先後被共軍佔領了一段時間。[54] 年末，共產黨活動開始滲透湖北省及安徽省北面的地方，使長江一帶局勢非常緊張。[55]

1948 年，對宣道會的西教士來說，「是令人沮喪的一年，因為一片陰霾正籠罩着中國」。[56] 隨着共軍對華中及中國西北等地區步步進逼，西教士只有把握當前的時間及機會工作，儘量安排令會、巡迴佈道及特別聚會。[57] 年初，國內局勢有明顯的轉向，國軍節節敗退；共軍則控制了東北三省大部分地方，戰況對共產黨愈來愈有利。在河南省，所有基督宗派的差會已匆匆撤離，很多西教士由中國東北逃至漢口暫避。[58] 當時局勢的發展，國民政府大有輸掉政權的可能，這事情令宣道會中、西同工感到極度不安。他們心裏明白，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執政是有利於福音傳播;況且美國是國民政府的盟友。相反地，共產政權無助於宣教工作，且會排拒西方的差會組織。[59] 當時，在北方共軍佔領的解放區，外國差會的工作已被迫終止，而反對基督教會的事件亦時有發生。[60] 因此，西教士對共軍在戰局取得的優勢，顯得相當憂慮。

基於局勢的發展，在踏入 1948 年，西教士包忠傑牧師便召集宣道會四個教區的中、西同工領袖，於武昌進行首腦會議，共同商討對策。會議於 1 月中旬舉行，出席者包括：「華中教區」代表 —— 差會主席戴維斯牧師 （Rev. W. G. Davis）、伍恩蘭教士（Miss Woodberry）[61]，華

---

[54] "Letter to Dr. Snead," (27 Oct., 1947). 筆者只擁有文件的部分，收件人是總會國外部施納德牧師，寄件者名字不詳；從內容看很可能是出自戴維斯牧師（Rev. W. G. Davis）的手筆，當時他剛上任華中區差會主席。

[55] "One For Another," *The Alliance Weekly* 82, no. 52 (27 Dec., 1947): 826.

[56] 包忠傑：《包忠傑自傳》，頁152。

[57] 包忠傑：《包忠傑自傳》，頁152。

[58] "From the Editor's Pen," *The Alliance Weekly* 83, no. 7 (14 Feb., 1948): 98; "One For Another," *The Alliance Weekly* 83, no.9 (28 Feb., 1948): 139.

[59] "From the Editor's Pen," *The Alliance Weekly* 83, no.7 (14 Feb., 1948): 98.

[60] "Done Upon the Earth," *The Alliance Weekly* 83, no.25 (19 June, 1948): 391; "One For Another," *The Alliance Weekly* 83, no.17 (24 April,1948): 266.

[61] 伍恩蘭教士是上海宣道會守真堂創辦人伍約翰牧師（Rev. John Woodberry）的女兒。

人領袖沙毅牧師、邵鏡川牧師、谷賢民牧師；「川黔教區」代表 —— 差會主席包忠傑牧師，華人領袖朱長裕牧師、向日暄牧師；「華南教區」代表 —— 差會主席丁惠民牧師，華人領袖趙柳塘牧師、楊濬哲牧師；「華西教區」代表 —— 該區沒有差會代表出席（原因不明，筆者估計是因當區較為偏遠崎嶇，在嚴凍的天氣下導致對外交通斷絕之故[62]），華人領袖則有來自甘肅和藏人區的代表出席，姓名不詳（筆者找不到相關紀錄）。四個教區聚首一起來商討事情是前所未有，而會議最主要目的，是探索以各種可行方法，來達致在短時間內籌組中國人管理的宣道會，以便本地信徒和教會能夠迎向不可預知的未來。最後，四區代表均贊同籌組一個名為：「中國基督教宣道會籌備委員會及執行委員會」；該組織在四個教區之上，負責統籌宣道會在中國大陸的一切事宜。委員會主席由沙毅牧師出任，邵鏡川牧師為副主席，趙柳塘牧師為書記。另外，會議又議決除西教士的住宅外，西差會在華所有房屋物業將一律交華會管理。[63]

1948 年中旬，宣道會除華中教區外，華西教區亦開始受到內戰的威脅；國共兩軍開始在甘肅省的東面對壘，該教區一些原有計劃亦需要重新部署。[64] 11 月，共軍在東北三省取得重大勝利，國軍已無力抵擋從北面蜂擁而至的共軍；華東及華中局勢變得非常危急。因此，在華中教區的所有女西教士及子女需要轉至廣東和香港暫避，以免局勢進一步惡化；男西教士則繼續留守教區至最後時刻，冀望把握最後機會作巡迴佈道及訓練信徒。[65] 為了方便日後作全面撤退，這時包忠傑夫婦更匆匆南下廣

---

[62] 參考王建平：〈海映光牧師年譜〉，《本土經驗 —— 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在中國的相遇和對話》（香港：建道神學院，2017），頁175。

[63] 這段落的內容參考下列資料：包忠傑：《包忠傑自傳》，頁152；羅腓力：《宣道與中華》（香港：宣道，1997），頁233～234、圖片專輯頁44；趙柳塘：〈基督教會四十年之我見〉（寫於1964年7月23日，該文章其後轉載在羅腓力：《宣道與中華》，頁197～198。）

[64] "One For Another," *The Alliance Weekly* 83, no. 22 (29 May, 1948): 347.

[65] A. C. Snead, "Items Regarding China As Prepared By ACS And Presented To Sub-Committee Of The Foreign Department" (18 Nov., 1948).

州及香港辦理租賃房子的事宜，以防範一旦中國政權出現變化，整個差會也可有立足的地方。[66] 年終，共軍開始進入安徽省，華中教區部分教會及宣教站已落在共產黨控制之下。[67]

1949 年初，任何人都可以預測中國內戰最終的勝負誰屬。從 1948 年 9 月至 1949 年 1 月，國民黨在短短四個月損失一百五十萬名軍人。在如此驚人的慘敗之下，爭勝的信心已喪失淨盡，再加上通貨膨脹的失控與人民普遍厭戰的情緒下，國軍兵敗如山倒。1949 年 1 月 21 日蔣介石辭職，代總統李宗仁試圖與共產黨進行和談。在共軍勢不可擋的情況下，宣道會再將華中及川黔教區一批年輕正在學習華語的西教士調遷至華南教區。此舉有利他們繼續學習之餘，也方便在局勢進一步惡化時將他們迅速撤離。[68] 同年 2 月，為避免不穩定的局勢而導致各項物資供應斷絕，華西、川黔及華中教區將大部分西教士轉移至香港暫避，靜觀局勢變化後再作打算；三個教區只剩下數名資深西教士作最後階段的部署。[69] 至於華南教區，當時的情況還是相當平靜，教會的佈道及培訓工作一切如常，西教士人數沒有減少，但也開始感到重重壓力。在梧州，從各個教區而來的年輕西教士仍在努力學習華語。[70] 4 月 20 日，國共兩黨在北平的和談宣告失敗，共軍隨即渡過長江，三天後奪取首都南京，國民政府被迫遷往廣州。這時，國民黨大勢已去，西教士心裏亦清楚明白，他們還可逗留在中國的日子顯然非常有限。有見情況急轉直下，四個教

---

[66] "From the Editor's Pen," *The Alliance Weekly* 83, no. 49 (04 Dec.,1948): 770; Bollback, *To China and Back*, 22; 包忠傑：《包忠傑自傳》，頁157。

[67] "One For Another," *The Alliance Weekly* 83, no. 52 (25 Dec., 1948): 827.

[68] "One For Another," *The Alliance Weekly* 84, no.5 (29 Jan.,1949): 75.

[69] "From the Editor's Pen," *The Alliance Weekly* 84, no.7 (12 Feb.,1949): 98; "Everywhere Preaching," *The Alliance Weekly* 84, no.8 (19 Feb.,1949): 125; "One For Another," *The Alliance Weekly* 84, no. 9 (26 Feb.,1949): 139; "One For Another," *The Alliance Weekly* 84, no. 13 (26 March,1949): 203.

[70] "One For Another," *The Alliance Weekly* 84, no.18 (30 April, 1949): 283; A. F. Desterhaft, "Letter to Dr. A. C. Snead," (26 April, 1949); 劉福羣：《十架與冠冕》（香港：宣道，1979），頁112。

區的差會主席以電報聯名上書美國總會，請求國外部秘書長（Foreign Secretary）施納德牧師（Rev. A. C. Snead）緊急前來中國，共同商討當前對策。[71]

四　宣道會西差會撤出中國大陸的經過

（一）總會施納德牧師來華所做的決定

中共佔領南京以後，便積極籌劃攻取中國的遠東金融中心；大家亦預期，假若上海被攻克，下一目標必然是華南地區。5 月 12 日，共軍開始在上海外圍發動攻勢；當時，宣道會西教士及其家眷大多駐留香港、廣東與廣西三地。因此，計劃在 6 月初飛抵香港的施納德牧師，在出發前也要緊急致函每一位西教士，將美國總會的指令告知，以防備意外的情況發生。信件在 5 月 11 日發出，大致內容如下：

1. 第一任期的西教士必須離開中國工場，並將獲調派到其他亞洲工場服侍；
2. 所有西教士必須留在中國，等待施納德牧師於 6 月抵達香港，商討去向；
3. 考慮到可能有意外的情況發生，促請成立緊急協調小組，在緊急的情況下可作人事調度及轉移；小組成員包括 —— 召集人：貝光道牧師（Rev. John Bechtel)[72]；其他組員：包忠傑牧師、戴維斯牧師、丁惠民牧師及劉福羣牧師（Rev. William C. Newbern）[73]；

---

[71] "Everywhere Preaching," *The Alliance Weekly* 84, no. 22 (28 May, 1949): 349.

[72] 貝光道牧師是宣道會華南教區香港區負責人，主要工作是管理在九龍的宣道會兒童宿舍（Alliance Hostel）；當時已有大量西教士暫居在宿舍內，等候施納德牧師的到來。

[73] 包忠傑、戴維斯及丁惠民分別為川黔、華中及華南差會主席，當時華西差會主席海映光牧師（Rev. C. D. Holton）仍然留守甘肅。劉福羣牧師是梧州建道聖經學院的院長。

4. 總會認為，仍然留在華中、川黔及華西教區的西教士必須立刻轉到廣東或香港;在華南教區的西教士也要做好撤退的準備。[74]

這時，第一任期的西教士、四教區差會主席、三個教區大部分的西教士（當時華南教區西教士仍在工場）已齊集香港，等待施納德牧師的到訪，並聽候他的調度與安排。施氏此行，在香港分別有三段時間。首先，施氏由紐約經三藩市後飛抵香港，停留三天。在 6 月 1 日至 3 日裏，施牧師在下榻的酒店接見第一任期的西教士，聽取他們對工場調配的意願。另外，施氏亦會見了四個教區的主席和香港代表貝光道牧師，共同商討中國局勢的變化，以便能作出適當的判斷。[75]

施牧師在 6 月 3 日晚上離開香港，先後前往曼谷及西貢出席兩地的差會會議。6 月 27 日，施氏從西貢返回香港，這次逗留共有四天時間；在 28 日至 30 日期間，施牧師再度約見第一任期的西教士，並就他們日後的去向作最後定斷 —— 除兩對西教士夫婦因特殊原因要返回美國外，其餘都被調派往遠東其他非華語的宣教工場，並需即時學習另一種語言。[76]

7 月 1 日，施氏由香港飛往華南教區總部的所在地柳州，準備出席華南區華人聯會第八次會議，[77] 然後計劃與身在廣西所有西教士乘坐專機，飛往香港出席華南教區差會年會（也可說是施氏帶領他們撤離中國大陸）。適逢廣西各地洪水暴漲，桂平以下的水陸交通全部中斷，桂平及梧州等代表因此未能出席聯會；會議揭幕禮亦要延期。會議在 6 月 29 日至 7 月 5 日舉行，施氏在會中發表講話並勉勵當地信徒要勇敢面對不

---

[74] A. C. Snead, "Letter to Missionaries in Our China Fields," (11 May, 1949). 內容由筆者翻譯。

[75] A. C. Snead, "From New York to Bangkok," *The Alliance Weekly* 84, no. 27 (2 July, 1949): 423.

[76] A. C. Snead, "Grace and Grief in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84, no. 34 (20 Aug., 1949): 538-39.

[77] 華南區華人聯會名曰：「廣西宣道會華人省聯會」，在1927年成立。

可預知的將來。會議中，眾人推舉趙柳塘牧師為聯會主席，填補上年因楊濬哲牧師辭任的空缺。在差不多同一時間，華南教區西教士合共男女二十多名，由各宣教點帶齊行李在當地集合（有數名西教士因洪水之故不能抵達）。他們在 5、6 月時已接獲上級指令，吩咐他們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務必於 7 月前抵達柳州，與總會施牧師一同出席華南教區差會年會（後來計劃改變，他們要先由柳州撤至香港，而年會則改在香港舉行）。7 月 7 日，施納德牧師、眾宣道會西教士（包括華南區和在較早前撤退至當地的各區西教士）與趙柳塘牧師，共約二十八人一同乘坐路德會的包機「聖保羅號」由柳州飛往香港；而當中大部分西教士此去不再復返，從此與服侍多年的教會和信徒作永久分離。[78]

7 月 8 日，華南教區差會年會在香港舉行，會期共五天，由主席丁惠民和總會施納德兩人共同主持；華會主席趙柳塘牧師也有出席。當時內戰已逼近兩粵地區，眼見國民政府的崩潰勢在必行，此時美國總會已決定將差會撤出中國大陸。[79] 因此，是次會議主要是商討如何將華南教區內所有事務及房產一併移交華會接管；而華南教區西教士日後的工作安排，則不在議程之內，而改由總會（即施納德）與各人斟酌處理。[80] 筆者相信，會議在十分沈重的氣氛下進行，議決的內容大致如下：

1. 全體西教士應撤出廣西；
2. 追認 1948 年 1 月在武昌舉行的宣道會首腦會議之議決：西差會在國內的房產由華會接管；

---

[78] 以上內容是根據下列資料：傅證道牧師（Rev. Christian C. Fowler）的個人扎記，由其子傅堅理牧師（Rev. Charles W. Fowler）提供；趙柳塘：〈基督教會四十年之我見〉；Leo T. Chao, "Honorary Chairman's Report of South China Chinese Alliance," (16 July, 1949)。（這是趙柳塘牧師在香港以英文撰寫，相信是上呈總會的報告）；劉恩厚：〈廣西基督教宣道會在解放前後的應變措施〉，《廣西文史資料選輯》第四輯（1963年6月），頁171～172；Snead, "Grace and Grief in China," 538-39.

[79] A. C. Snead, "China Situation and Transfer of Missionaries," "Report of Deputation by Foreign Secretary, May 28-August 25, 1949," (1949).

[80] 趙柳塘：〈基督教會四十年之我見〉；劉福羣：《十架與冠冕》，頁112～113；Snead, "Grace and Grief in China," 538-39。

3. 此會議後，差會主席丁惠民牧師應偕同差會委辦回到梧州，召開協會;[81] 正式將教會行政權、產業權及管理權等移交華會，並舉行授權典禮；
4. 按立范能彬、劉恩厚和鍾本庸三位華人傳道為牧師；
5. 日後將取消協會，一切會務由廣西宣道會華會處理。[82]

華南差會年會結束之後，總會施納德牧師也分別與川黔、華中及華西教區代表舉行相類似的會議；這三區會議的規模較小，除出席者不及華南區那樣整全以外，議決事項亦不及華南區那麼周詳細緻。[83] 另外，施氏亦與包忠傑牧師商討宣道書局轉往海外的事宜。他們認為在當前的局勢，文字工作是宣道會在中國至關重要的事工；雖則西教士不能在中國工作，但基督教書籍及刊物仍可進入內地，藉文字方式牧養眾多信徒。因此，他們安排馬三姑教士（Miss Ethel Marsh）由上海轉到新加坡延續《聖經報》的發行；劉福羣夫婦在轉往西貢之後，將協助《聖經報》編輯青年版，並於中南半島華人圈子內作廣泛推廣；餘雅小姐（Miss Edith Alexander）則與包牧師在香港設立書局辦事處。[84]

在餘下的日子，施牧師花了相當時間約見每一名西教士，他先徵詢各人的意願，然後才分派他們到其他工場去。所有在中國工作超過一個任期的西教士，大多被調派到東南亞地區的華僑羣體中服侍，假若日後中國宣教大門再度重開，他們便可立刻返回內地工作。幾位較為年長的西教士則調回美國，從事行政工作或提早退休。施牧師在 7 月 28 日轉往馬來西亞，離港前叮囑貝光道牧師及包忠傑夫婦必須留守香港至最後一

---

[81] 協會（The Joint Executive committee）在1927年後成立，由華會與差會聯合組成，以協調兩會在教區內的工作。

[82] 趙柳塘：〈基督教會四十年之我見〉；劉恩厚：〈廣西基督教宣道會在解放前後的應變措施〉，頁173～174。

[83] 包忠傑：《包忠傑自傳》，頁160～161； "Everywhere Preaching," *The Alliance Weekly* 84, no. 22 (28 May, 1949): 349; A. C. Snead, "Grace and Grief in China," 538-39.

[84] A. C. Snead, "China Situation and Transfer of Missionaries" ; "One For Another," *The Alliance Weekly* 84, no. 30 (23 July, 1949): 475; 包忠傑：《包忠傑自傳》，頁164。

刻（此時香港也有被解放的可能），以協助西教士同袍的轉移，保持與國內信徒聯繫及處理中國教區的善後工作。[85]

（二）西教士在教區的最後時刻

總會代表施納德牧師已明確表示，差會必須在解放前撤出中國大陸；他在臨行前完成西教士的調度，並任命他們到東南亞不同的宣教工場上任。施氏離開香港後，一些資深西教士則把握最後機遇，再度返回中國工場作最後的部署和安排。

在華西教區，差會主席海映光牧師 （Rev. Carter D. Holton）[86] 早於 7 月 8 日重返教區，回到甘肅與西藏交界，與仍在當地工作的同袍季維善牧師夫婦 （Rev. & Mrs. M. G. Griebenow）、納慈恩牧師夫婦（Rev. & Mrs. C. E. Notson）及何佩道教士 （Miss Anna Haupberg）爭取最後機會向藏民佈道，並打算留至最後一刻。[87] 最終，因局勢急劇惡化，他們在 8 月時必須全面撤離，臨行前將一切工作移交華會處理。[88]

在川黔教區，差會主席包忠傑牧師和鄭哲克牧師（Rev. E. A. Truax）在 8 月 14 日返回重慶，在酉陽一個新宣教站主持青年夏令會。之後，他們把差會可變賣的物資全部賣掉，包括所有車輛；所得款項除處理工場未決的事情外，大部分是換作銀元再分發給每位中國同工的，

---

[85] 包忠傑：《包忠傑自傳》，頁160～161； "Everywhere Preaching," *The Alliance Weekly* 84, no.22 (28 May, 1949): 349；Bollback, *To China and Back*, 71；A. C. Snead, "Grace and Grief in China," 538-39。

[86] 在羅腓力：《宣道與中華》一書，作者將Rev. Carter D. Holton的中文名字稱為何佩道牧師；自此，香港宣道會人士就一直使用這中文名字來稱呼其人。不過，在最近王建平先生的查證，Rev. Carter D. Holton 在華使用的中文名字為海映光牧師，而何佩道是另一位宣道會在華西教士 Ms. Anna Haupberg所使用的中文名字。以上參考自王建平：〈海映光牧師年譜〉，《本土經驗 —— 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在中國的相遇和對話》（香港：建道神學院，2017），頁161，注腳2的論述。

[87] A. C. Snead, "Grace and Grief in China," 538-39; "One For Another," *The Alliance Weekly* 84, no. 30 (23 July, 1949): 475.

[88] "One For Another," *The Alliance Weekly* 84, no.35 (27 Aug.,1949): 555.

讓他們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以面向未來。9 月 18 日，兩人返回香港。他們原打算再返回川黔教區，但卻因局勢的發展而未能如願。[89]

在華中教區，8 月時該區大部分地方已落在中共的管治之下，因此在香港的西教士已無法重返工場;而留在工場尚未撤出的就只有兩人 ——在上海教會的穆里牧師（Rev. E. G. Murray）和在武昌看守物業的司佐本牧師 （Rev. R. H. Sjoblom）；[90] 前者在 1949 年 9 月才離開上海，[91] 後者則要遲至 1950 年下旬，在獲釋後經香港離開中國。[92]

至於華南教區，情況與其他教區略有不同；該區位處偏遠，因此受內戰的影響亦相對較遲。在 1949 年 8 月至 10 月期間，區內大部分教會及宣教站仍可如常運作，只是交通因土匪的猖獗而時有中斷。[93] 年會過後，西教士仍可以自由進出該區。8 月，丁惠民和趙柳塘先由香港返回柳州，處理教區事務；9 月，兩人再轉到梧州。[94] 另外，差會委辦劉福羣牧師，與及霍敦牧師（Rev. W. H. Holton）和何恩德牧師（Rev. R. A. Kowles）由香港飛抵梧州，出席 9 月 25 日建道聖經學院的開學禮及協會會議。9 月 27 日，中西兩會領袖在白鶴山宣道會公寓外舉行授權典禮，象徵差會將教區一切事務交由華會管理。9 月 30 日，中西領袖按立范能彬、劉恩厚和鍾本庸三名傳道人為牧師（上次按立華人牧師是在十五年前）。這些事情以後，丁惠民與趙柳塘再返回柳州正式辦理實質移交；丁氏將平日存放在差會的黃金、白銀及現鈔轉交趙牧師收存，作為日後

---

[89] E. A. Truax, "Southwest of the 'Bamboo Curtain'," *The Alliance Weekly* 84, no.43 (22 Oct., 1949): 682.

[90] Howard Van Dyck, "News from Communist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84, no.33 (13 Aug., 1949): 523. 兩人的中文名字由筆者翻譯。

[91] "Everywhere Preaching," *The Alliance Weekly* 84, no.45 (5 Nov., 1949): 717.

[92] Bollback, *To China and Back*, 70; "Everywhere Preaching," *The Alliance Weekly* 86, no.4 (27 Jan., 1951): 61.

[93] August F. Desterhaft,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C&MA, Annual Report – 1949;" A. F. Desterhaft, "Letter to Dr. A. C. Snead," (5 Oct., 1949).

[94] A. F. Desterhaft, "Letter to Dr. A. C. Snead," (15 Sept., 1949).

緊急應變的特別款項。[95] 廣西解放前夕，除何恩民牧師夫婦（Rev. & Mrs. A. G. Kowles）仍留在靖西外，最後幾位西教士是在 11 月 3 日離開。何牧師夫婦則遲至 1951 年 4 月才離去，他們是宣道會最後撤出中國大陸的西教士。[96]

（三）西教士去或留的思量與抉擇

直至 1949 年下旬，大部分西教士仍逗留香港。他們大多遵照總會施納德牧師 7 月時所作的安排，等候入境簽證並預備前赴新委派的工場，亦有部分人因為種種的理由，不情願離開中國，他們選擇停留香港以觀察時局變化，並打算游說總會改變初衷，讓他們可繼續留在內地或香港工作。[97]

首先，對於那些第一任期的西教士，當知道總會將要調派他們前往其他工場，並且要忘掉這兩、三年學習的華語，再度學習另一種語言的時候，感到非常無奈：「這消息就像野火一樣在所有第一任期西教士中傳開……我們是因呼召而來到中國，這安排令我們相當失望。」[98] 因此，部分西教士隨即向總會申請，希望准許停留在中國邊境地方，繼續學習華語，部分則希望差會的調配只屬臨時性質，當中國的宣教大門再度重開，他們可獲准重返內地；亦有部分華南區西教士希望留在香港，在這毗連大陸的殖民地繼續學習語言，同時亦尋找機會開展新的事工，服侍大批滯留當地的難民。他們以上的種種請求，都一一被總會否決，且勒令儘快前往新調配的工場上任。[99]

---

[95] 趙柳塘：〈基督教會四十年之我見〉；劉恩厚：〈廣西基督教宣道會在解放前後的應變措施〉，頁174～175；A. F. Desterhaft, "Letter to Dr. A. C. Snead," (5 Oct., 1949).

[96] "Everywhere Preaching," *The Alliance Weekly* 86, no. 17 (28 April, 1951): 269.

[97] A. G. Kowles, "By Flood and By Field," *The Alliance Weekly* 84, no. 40 (1 Oct., 1949): 632.

[98] Bollback, *To China and Back*, 22. 筆者翻譯。

[99] A. C. Snead, "Letter to Missionaries in Our China Fields," (11 May, 1949); A. C. Snead, "China Situation and Transfer of Missionaries;" A. C. Snead, "Letter to the Chairmen of the China Fields and Mr. Bechtel," (6 Sept., 1949).

至於那些在中國大陸工作有一段日子、擁有相當經驗的西教士，處境就更加艱難。雖然他們全被調派到東南亞的華人社區服侍，沒有學習其他語言之煩惱，而總會亦向他們承諾，如若日後中國宣教之門再度重開，就可重返內地。不過，他們在中國服侍已有多年，部分較資深的西教士更是窮半生時間在當地建立教會，與內地信徒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他們實在難以就這樣離去。如上文所述，部分有相當經驗的西教士打算留待教區至最後時刻，少部分更是在解放之後，甘願冒性命與監禁的危險，選擇留守區內工作。部分已撤出內地的西教士，則打算在香港停留一段時間，以觀看局勢的發展，再作打算。[100]

特別是華南教區的西教士，他們更有充分理由逗留香港。皆因這殖民地是原屬教區的範圍內，在九龍已建有一間堂會和一所宣道會兒童宿舍（Alliance Hostel），[101] 況且當時有大量移民和難民因內戰之故由內地湧入香港，數量達一百萬之多；因此，華南區差會極力爭取留在香港發展事工。此舉除可讓西教士能繼續工作之餘，同時亦可與廣西信徒保持聯繫。當內地工場重開時仍有足夠西教士重返各宣教站，可說一舉多得。原初施納德牧師也認真考慮這個建議，並打算安排深諳粵語的傅證道牧師夫婦（Rev. & Mrs. Christian C. Fowler）發展香港事工。[102] 不過，美國總會基於香港局勢亦不太樂觀，認為中共政府大有可能在短時間內收回

---

[100] Snead, "Letter to Missionaries in Our China Fields," (11 May, 1949); Snead, "China Situation and Transfer of Missionaries;" A. C. Snead, "Letter to the Chairmen of the China Fields and Mr. Bechtel," (6 Sept., 1949).

[101] 該堂會日後演變為現今的「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是在日本侵佔香港以前，由宣道會華南區西教士貝光道牧師個人創立；該堂會並不隸屬宣道會美國總會和華南教區差會。「宣道會兒童宿舍」則是托管宣道會西教士子女的地方，由貝光道牧師夫婦負責管理。「宣道會兒童宿舍」和早年「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的事情，可參考何明章：〈兩個宣道會的故事：「中華宣道會」與「香港宣道會」〉，《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通訊》第66期（2018年1月），頁17～27。

[102] Snead, "China Situation and Transfer of Missionaries."

這塊殖民土地，因此最終決定不在香港發展，且召回傅牧師夫婦及其他西教士立刻返回美國。[103]

華南區差會丁惠民牧師和執委對總會的決定感到非常失望，他們深信中共政府不打算解放香港，並且認為與其將資深同工調往菲律賓等只有數十萬華人的社區工作，倒不如派遣他們在有百多萬名華人的香港發展。[104] 其後，丁氏多次寫信給總會施納德牧師，力陳保留華南西教士在香港的理由，都不得要領。[105] 最後，因總會遲遲沒有表態支持他們留在香港，大部分西教士再沒有耐性如此等候而選擇離開。[106] 不過，仍有數名華南區西教士堅持留下，最後總會也無可奈何接納他們的抉擇。其中劉福羣牧師獲准在長洲延續建道聖經學院的工作，劉夫人在宣道書局主編青少年刊物《少年良友》，[107] 丁惠民和其他人則協助跟進中國教會的事宜。

1950年初，仍逗留在香港的宣道會西教士共有十一名，他們分別是：負責在香港開展宣道書局工作的包忠傑牧師夫婦和餘雅小姐、原屬華南教區西教士貝光道牧師夫婦（以上人士是按總會吩咐留下）、丁惠民牧師、劉福羣牧師夫婦、高麗雲姑娘（Miss Charlotte Galvin）及原華西教區主席海映光牧師和夫人。後來，他們在香港成立「全中國委員會」（All China Committee)，代表總會執行中國四個教區的支援及善後工作。[108]

---

[103] Snead, "Letter to the Chairmen of the China Fields and Mr. Bechtel," (6 Sept., 1949); 傅證道牧師（Rev. Christian C. Fowler）的個人扎記。

[104] Desterhaft, "Letter to Dr. A. C. Snead," (15 Sept., 1949).

[105] Desterhaft, "Letter to Dr. A. C. Snead," (10 Oct., 1949); Desterhaft, "Letter to Dr. A. C. Snead," (17 Nov., 1949).

[106] Desterhaft, "Letter to Dr. A. C. Snead," (22 Nov., 1949).

[107] 劉氏選擇留下和在長洲延續建道聖經學院的心路歷程，在《十架與冠冕》一書有詳盡紀錄。

[108] Paul H. Bartel, "The All China Committee Chairman's Report (1950)." 海映光牧師夫婦最後在1950年8月21日返回美國，見Paul H. Bartel, "Report of the All China Committee (1950)"。

五　解放初期中國教會的概況

（一）政權交替時的情況

宣道會的工場主要位於長江以南或偏遠的西北地區，因此沒有受到內戰炮火的影響。政權交替時，大部分地區都是在平靜的情況下進行：「這邊廂國民軍在撤退，那邊廂共軍則入城進駐」，[109] 沒有做成嚴重破壞。後來，新政府宣告人民可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信徒的擔憂也逐漸減少。[110] 解放初期，中共政府並沒有干涉教會運作。宣道會在中國同工的帶領下，大部分事工一如以往，只有少量堂會被軍隊徵用作辦公或住宿的地方。[111] 在上海和廣西，福音工作依然相當興旺，渴慕真理的人很多，大批初信者等候領受水禮。[112] 在武昌與梧州，宣道會兩所聖經學院仍在培訓學生，期望可儘快為中國教會提供急需要的人才。[113]

（二）教會自養的挑戰

解放初期，對內地教會來說，最大的挑戰是在西差會突然撤退的情況下，華會一下子要承擔教區所有的管理職責，這使華人領袖感到擔憂：

> 我覺得這是非常嚴肅的時刻，內心十分沈重。因為西教士的離開，意味着教會的工作便要由我們接班。換言之，解放後教會的未來，便落在我們身上！我感覺到這是生命的負擔。[114]

---

[109] 梁得人：〈腳蹤遍寰宇〉，朱秀蓮、邢福增編：《我們的薦書 —— 建道神學院梧州期校友見證集》（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頁153。

[110] Desterhaft, "Letter to Dr. A. C. Snead," (6 Dec., 1949); 梁清輝：〈一生堅苦事主的傳道者〉，朱秀蓮、邢福增編：《我們的薦書》，頁169。

[111] August F. Desterhaft,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C&MA, Annual Report – 1949;" "One For Another," *The Alliance Weekly* 85, no.12 (25 March,1950): 187.

[112] Desterhaft,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C&MA, Annual Report – 1949;" "One For Another," *The Alliance Weekly* 84, no.44 (29 Oct.,1949): 698; Paul H. Bartel, "Chairman Report of All China Committee (1950)" .

[113] Desterhaft, "Letter to Dr. A. C. Snead," (22 Nov., 1949).

[114] 余耀昆：〈為廣西教會奉獻自己〉，朱秀蓮、邢福增編：《我們的薦書》，頁99。

當時經濟情況惡劣，信徒普遍貧窮。因此教會首要面對的難題，莫過於在短時間內達致收支平衡。可是，各教區除幾所位於城市的大型堂會外，其餘的都需要外來資金援助才可保持良好運作。[115] 另一方面，聖經學院的工作亦必須有足夠資金來維持，學院除需要支付華人老師的薪酬外，亦需要援助在校的神學生。以梧州聖經學院1949至1950學年為例，就有達二十多位同學要依靠西差會的資助才可維持生活，差會的撤離代表他們有輟學的可能。[116] 因此，擺在堂會或聖經學院面前的，是先要想法子邁向自養自足，否則就要面臨關閉的命運；而對一些在窮鄉僻壤且成立不久的堂會，處境更是非常艱難。

直至1950年下旬，在香港的全中國委員會仍可透過不同的方式和渠道，將資金款項交到各教區的華會負責人，然後再經他們分發給當地同工，以維持各地堂會的運作。[117] 隨着中共政府推行各種宗教政策，內地信徒再不能與香港西教士保持聯繫，教會更是不容許接納由外國差會而來的任何資助，否則會被認為有通敵之嫌。因此，從1951年起，內地宣道會可算是完全自養與自治；當然，部分堂會是在沒有外來援助的情況下而關門結束。[118]

（三）新宗教政策下所帶來的挑戰

> 基督教最大的問題，是它同帝國主義的關係問題。中國基督教會要成為中國自己的基督教會，必須肅清其內部的帝國主義的影響與力量，依照三自（自治、自養、自傳）的精神，提高民族自覺，恢復宗教團體的本來面目，使自己健全起來。[119]

---

[115] Leo T. Chao, "Honorary Chairman's Report of South China Chinese Alliance," (16 July, 1949).

[116] Desterhaft, "Letter to Dr. A. C. Snead," (10 Oct., 1949).

[117] Bartel, "Report of China (1950)."

[118] Bartel, "China Chairman's Report (1951); " William C. Newbern, "South China Report to Conference (1951)" .

[119] 周恩來：〈關於基督教問題的四次談話〉，1950年5月。

以上是 1950 年 5 月周恩來總理與基督教人士見面的講話，正代表新中國對基督教的基本看法與評價；當時朝鮮戰爭（韓戰）尚未爆發。

對當時的宣道會來說，教會或聖經學院是否應向新政府登記註冊，是十分惱人的事情。假若選擇「註冊」的話，則政府可選派代表加入教會或學院，並有權作任何人事調配和活動安排，而日後宣道會因信仰原則希望結束教會或學院，都是沒有權利的。但假若選擇不向政府「註冊」，則教會或聖經學院隨時有被勒令關門的可能。[120] 1950 年 4 月，在全中國委員會（差會）的會議上，西教士議決在 7 月舉行一次中國宣道會教區聯會，並召集內地各區領袖前來香港赴會，以討論新政策下所帶來的種種問題。[121] 該會議在 7 月 27 日至 8 月 2 日一連七天假宣道會兒童宿舍內舉行，與會者包括：全中國委員會委員：包忠傑牧師、貝光道牧師、丁惠民牧師、海映光牧師及餘雅小姐五名；中國基督教宣道會委員：沙毅牧師、邵鏡川牧師、谷賢民牧師、趙柳塘牧師、劉恩厚牧師、范能彬牧師（華西及川黔教區代表缺席）；而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丘育靈牧師亦應邀列席。[122] 會議內容大致如下：

1. 為內地宣道會有需要向新政府註冊的可能，四教區必須在統一的組織下，有自己的章程和憲法；
2. 梧州聖經學院因老師嚴重缺乏，同意第三年學生轉往香港上課；
3. 追認早前會議（1948 年 1 月在武昌舉行的首腦會議），各教區的物業權與管理權，由差會移交華會；
4. 討論宣道會是否接受全國性基督教組織的邀請，派代表出席今年秋天在上海舉行的會議；議決派沙毅牧師前赴上海觀察，再作最後打算。[123]

---

[120] Desterhaft,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C&MA, Annual Report – 1949."

[121] Bartel, "Report of the All China Committee (1950)."

[122] "Minutes of the Joint Meeting of The All China Chinese and Missionary Committees," (27 July – 2 Aug., 1950).

[123] "Minutes of the Joint Meeting of The All China Chinese and Missionary Committees," (27 July – 2 Aug., 1950). 內容由筆者翻譯。

朝鮮戰爭爆發，中美關係急速惡化，新政府亦加強對基督教會的管治。1950 年 7 月 28 日，中國基督教界吳耀宗等人發起「三自愛國運動」，並發表《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宣言書（後稱：《三自宣言》），以號召全國各地教會要在國家的旗幟下團結一起，擺脫外國的影響與勢力。該文在 9 月 23 日刊載在《人民日報》，並呼籲全國信徒簽署效忠政府。其後，宣道會部分信徒亦有簽署宣言；差會認為這無疑是與無神論政權妥協，為此感到相當憂慮。[124]

（四）與西差會全面分離

踏入 1951 年，全中國委員會與內地教會的接觸已愈來愈少。新政府對內地教會的控制日益增加，雖然聚會仍可繼續，但一切宗教活動只容許在堂會內進行，浸禮也需要停止。[125] 因中國宣道會是由美國差會建立的組織，信徒均感到懼怕。一些信徒甚至發電報給香港的西教士，懇求他們不要寄任何信件、郵件、《聖經報》及其他刊物給他們，免得中共認為他們是美國間諜。[126] 政府鼓勵信徒指控與外國有聯繫的教會人士，部分同工領袖亦開始受到嚴厲的整頓。[127] 在這情況下，全中國委員會不得不與內地教會完全脫離，差會對內地教會的援助亦因而停止。[128]

如此，中國教會逐失去支援，傳道人的生活更是足襟見肘。[129] 部分同工因三餐難繼而被迫離開崗位，轉投其他工作。在資金和人手短缺下，

---

[124] Bartel, "Report of China (1950)."

[125] Bartel, "Report of China (1950);" Paul H. Bartel, "China Chairman's Report (1951)" ; A. F. Desterhaft, "The First Anniversary," *The China Tidings of the Christian & Missionary Alliance* (Jan., 1951): 3-4.

[126] Howard Van Dyck, "The Church Behind the Curtain," *The Alliance Weekly* 86, no.22 (6 June, 1951): 345-46; Paul Bartel, "Good News from Hong Kong," *The Alliance Weekly* 86, no.45 (14 Nov., 1951): 713.

[127] William C. Newbern, "South China Report to Conference (1951)."

[128] Bartel, "Report of China (1950)."

[129] 石愈堅：〈信心堅穩〉，朱秀蓮、邢福增編：《我們的薦書》，頁189。

梧州建道聖經學院在 1951 年 2 月停辦。武昌宣道聖經學院的營運亦非常困難，經濟來源中斷，教職員只能依靠子女的接濟過活，但學院仍堅持教授全部課程，使學員圓滿畢業後，才宣告結束。[130] 至於中國宣道會，則遲至1958年內地教會實施大聯合，各大小教會併入三自愛國教會以後，才正式劃上句號。

六　結論

本文已闡述了內戰時期中國宣道會的情況。總括來說，中日戰爭期間，宣道會大部分堂會及宣教站因戰事之故而被迫關門或遭受破壞。直至內戰爆發，宣道會西教士才陸續返回宣教工場，在艱苦的環境下與中國同工一起努力重建教會。正當教區復原工作略有起色之際，共軍在內戰中節節勝利使宣道會需要作出種種的部署。首先，該會在武昌成立四個教區的聯合組織，準備在短時間內將內地教會的管治權由差會轉到華會手上。另外，西教士亦因應局勢的變化，作出有系統和有秩序的撤離。因此在大陸全面解放之前，該會絕大部分西教士均能夠平安抵達香港。

中西教會分離，確實令當事人感到萬分難過。在西差會方面，無論是新上任或有經驗的西教士，他們大多不情願就這樣與中國教會離別。雖然美國總會已有明確指示，但他們仍不斷思量與尋找可留下的理由與方案。直至中國大陸全面解放，西教士只可懷着無奈的心情離去，但仍有少數人堅持留在香港，嘗試繼續與內地信徒保持聯繫，同時亦在本地尋找服侍機遇。在中國教會方面，最大的挑戰是在沒有西差會的治理與支援之下，瞬間要承擔教會所有財政和管理事宜。另外，內地信徒亦要面對和適應中共政府在宗教事務上的全新政策，特別是強調與外國

[130] 武昌宣道聖經學院結束的事情在美國總會的刊物裏沒有紀錄。以上資料乃是根據羅腓力：《宣道與中華》，頁87、90。

教會脫離關係和終止與西教士聯繫等方面，這些都使他們感覺格外艱難及戰兢。

國共內戰，是中國教會史上一段十分重要的時期。內戰的結果是大陸的全面解放，致使中國教會與外界教會全面分離，中外信徒斷絕交往，從此分道揚鑣。宣道會因傳教地點位處長江以南及偏遠的西北地區，所屬教區並沒有遭受內戰炮火的蹂躪，人命財產均沒有受到太大的損失。除此以外，該會能夠把握解放前二、三年短暫卻又寶貴的時間，重建荒涼多時的教區，鞏固各地信徒，培育華人領袖，並在艱苦環境下四出佈道，使更多人得聞福音。解放前夕，宣道會因應時局的變化而作出一系列的判斷與抉擇。在很早的時候，該會已正確估算內戰的勝敗誰屬，亦預見共產黨執掌政權後，國內教會和差會將要面臨何等樣的挑戰，從而作出適切的部署和安排。最後，美國總會向差會下達撤退的命令，無論在細節或時間方面，可算是拿捏得有分有寸。這使西教士能平安有序地撤出內地，既花費合宜，又可有足夠空間與華會共同處理交接的工作。

解放後，已有六十九年歷史的中國宣道會在國內教會大聯合下於焉告終。雖然如此，其組織及精神卻能夠在中國邊陲的香港得以承傳。從 1949 年起，那幾名堅持留守香港的宣道會西教士，他們藉多年在內地的宣教經驗，憑着堅毅不拔的意志，在這細小的英國殖民地上延續了宣道書局和建道聖經學院的工作與使命。[131] 不但如此，他們更在當地的難民營及新移民羣體中開展工作、建立教會；並在短短一年半時間內，會友數目由零迅速增加至一千多人。[132] 至 1953 年，他們分別在調景嶺、黃大仙、跑馬地、渣甸山、北角、筲箕灣及台北等地設立

[131] 「宣道書局」和「建道聖經學院」分別為現今的「宣道出版社」和「建道神學院」。

[132] 調景嶺難民營的事情可參考梁家麟：《福音與麵包 —— 基督教在五十年代的調景嶺》（香港：建道神學院，2002）。

了堂會及佈道所，[133] 其努力最終獲得總會的認同與讚許，並批准建立宣道會「中國－ 香港教區」。[134] 其後，他們工作的果效不單惠及香港，更幅射遠至對岸台灣、東南亞及世界各地華人社羣之中。有如此發展，相信是當日美國總會和差會萬料不到的。至於宣道會在香港的事蹟，因已超出本文題目與範圍，筆者另有文章作詳細論述。[135]

[133] 分別為：調景嶺堂、黃大仙福音堂、藍塘道福音堂、採石工人聚會所、北角堂、筲箕灣堂及長安西路佈道所（台北）。

[134] 參 "Minute of Hong Kong – Kowloon Area Conference (30 April, 1953)" 早年的宣道會「中國－香港教區」，其範圍包括香港和台灣兩地；當時已有大量宣道會調景嶺堂之會友，透過國民黨的安排由香港遷徙到台灣定居。後來，台灣宣道會漸漸茁壯成長，並在1960年8月開始脫離「中國－香港教區」而獨立，成為宣道會的第二十四個教區：「中國－台灣教區」。

[135] 香港宣道會的歷史可參考何明章：〈宣道運動在香港：香港宣道會的發展歷史(1949年-1999年)〉（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7）。

撮　要

從 1889 年起，宣道會西教士開始進入中國大陸，他們本着宣道會普世宣教的精神，致力走到偏遠未聞福音的地方努力開荒與建立教會。在 1937 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際，該會已在內陸省分建立了華中、華南、華西及川黔四個宣教區，並培育了不少基督信徒。二戰以後，該會西教士返回中國，希望重建教會，卻隨即迎來國共兩黨逐鹿中原、戰火瀰漫的艱難歲月。

宣道會在中國內戰時期的活動，迄今仍是一段相當模糊、鮮為人知的歷史。本文作者則利用西差會檔案資料、西教士傳記和當地教會的零星紀錄，描述了昔日二戰以後該會西教士是如何由北美返回中國的宣教工場，重整滿目瘡痍的教區。緊接着的是該會因中國內戰之威脅而要不斷遷移陣地的往事。文中亦論述在國軍節節敗退和共軍步步進逼的形勢下，宣道會人士是如何思量前面的路向，並為中國教會作出部署以迎接未來的變局。最後，文章記錄了該會全面撤離大陸的情況，亦描述西教士爭論是否延續中國福音的使命，選擇離去或仍然留在中國大地上所作出的種種思考與判斷。

ABSTRACT

Since 1889, C&MA missionaries started to enter into Mainland China. Based on the vision of global mission of C&MA, these missionaries would approach the places and people whom never heard of the gospel for mission work and to start up new churches. Prior to 1937, during which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commenced, C&MA already started up four mission fields: Central China, South China, Kansu-Tibetan Border and Kweichow & Szechwan. Post World War II, C&MA returned to China with the hope of re-building the churches. However, a new era has started, during which the Communist and Kuomintang were in contest and war has begun.

The activities of C&MA in Mainland China during the civil war period were very vague and not very well organised. This article aims to research on original materials from the C&MA US archive, missionaries' biographies as well as piecemeal information from the local churches in China, and to articulate how the missionaries returned to China from North America post WWII. The missionaries rebuilt the once devastated mission fields and subsequently had to relocate to various places due to the civil war. This article also explores how the missionaries made their plans whilst Kuomintang troops were defeated by the Communists, and this in turn rearranges the Chinese churches and its mission strategies. Towards the end, the article also describes

how C&MA completely departed China as well as how the missionaries debated over whether they should continue with the mission of evangelism within China. The way of how it was thought through and analysed i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as well.